

第一章 緒論

「比起擁有龐大市場的國家，小國的補強之道，是完全開放市場和採取全球化策略。」

Michael Porter¹

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際貿易理論告訴我們，自由貿易會促進對國際經濟社會的「整體福利」增長，促進資源在全球場域裡進行更有效率的配置。然而，這個理論卻沒有跟我們說明，貿易交流未必會對某一個國家有利；更無證明，自由貿易會使貿易伙伴間的生活水準均等化。此原因牽涉到，貿易與該國家所得分配之間的關係。國際上，國家不僅會以經濟安全和政治自主性的名義實行保護政策；在國內，不同的經濟利益團體也有動機去影響國家的貿易政策。²

貿易政策牽扯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政治面更是重要的決定要素。這種國內、外政經關係的磨合，正是造成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爭論糾葛幾百年的重要原因。經濟民族主義的生成背景最早源自於重商主義的思維。自民族國家正式成立以來，重商主義打著「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旗幟，鼓勵國家政府深刻地介入市場經濟的運轉過程，以確保經濟安全及政治自主性。

尤其在 17 世紀之後，歐洲經濟成長逐漸陷入停滯，各國為了確保財富能夠存留在國內，無不極盡所能地實行各種手段防止貴金屬流出，而此背景孕育了重商主義的 (mercantilism) 溫床。³

相反地，古典自由經濟學派重視國家對市場的不干預與放任性。亞當 斯密斯

¹ Michael Porter (1991),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² 何思因，*美國貿易政治* (台北市：時英出版社，1994 年)，頁 2~3；Melvyn Krauss (1997), *How nations grow rich: the case for free tra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5

³ 雅克 阿達，何靜、周曉辛譯，*經濟全球化* (台北市：米那貝爾出版社，2000 年)，頁 59。

(Adam Smith) 所主張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強調，放任「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逕行地運作，將會帶來經濟成長和效率運行的最大化。⁴在自由經濟學派的思維中，自利、理性、開放市場和自由競爭更是其核心思想：市場體系的基本原理是增加經濟效益、加速經濟成長、資源配置最佳化，從而改善人類福利的最佳利器。政府除了維持社會秩序，確保國家安全以及保障契約履行外，都不應該干預市場運行。⁵19世紀之後，英國的李嘉圖 (David Ricardo) 和德國的李斯特 (F. List) 各自從經濟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所發展出的比較優勢 (comparative advantage) 和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亦代表著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內涵的深化。⁶

然而，上述兩套看似相互衝突的理論，卻巧妙地相互融入了現代國家間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的脈絡中。不論是經濟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開放競爭或是經濟民族主義強調的市場保護，其核心本質都是在遵循國際貿易與市場交換的框架下運行。

因此，經濟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所帶來的效率、成長最大化，和經濟民族主義所提倡的政經自主性和國家安全兩者之間的調和⁷成為目前各國政府在處理國際政治經濟議題的核心議題。對一個高度依賴貿易為發展導向的國家而言，如何妥善處理市場開放和保護的課題，直接攸關該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

自 90 年代起，台灣的貿易依存度⁸遠高於美、英、日、德、法等國家，平均依存度值為 77%，在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中，排名第三。⁹有學者更指出，台灣的進出口總值佔國生產毛額的 87%。¹⁰顯見台灣是屬於高度出口導向的國家。

⁴ 亞當 斯密，李華夏譯，**國富論** (台北市：先覺出版社，2000 年)

⁵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2.; 蔣青主編，**世界經濟學：名著精讀** (台北市：雅書堂文化出版社，2002 年)，頁 46~56

⁶ Ricardo 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根據要素流動固定的假設為出發點，其認為，勞動生產力是左右生產的重要因素。與後來的 H-O 模型：「高度要素流動性」此假設略有出入。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蔣青主編，**世界經濟學：名著精讀** (台北市：雅書堂文化出版社，2002 年)；瞿宛文，「台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2 期，2001 年 6 月，頁 68。

⁷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 (台北市：生智出版社，2000 年)，頁 198~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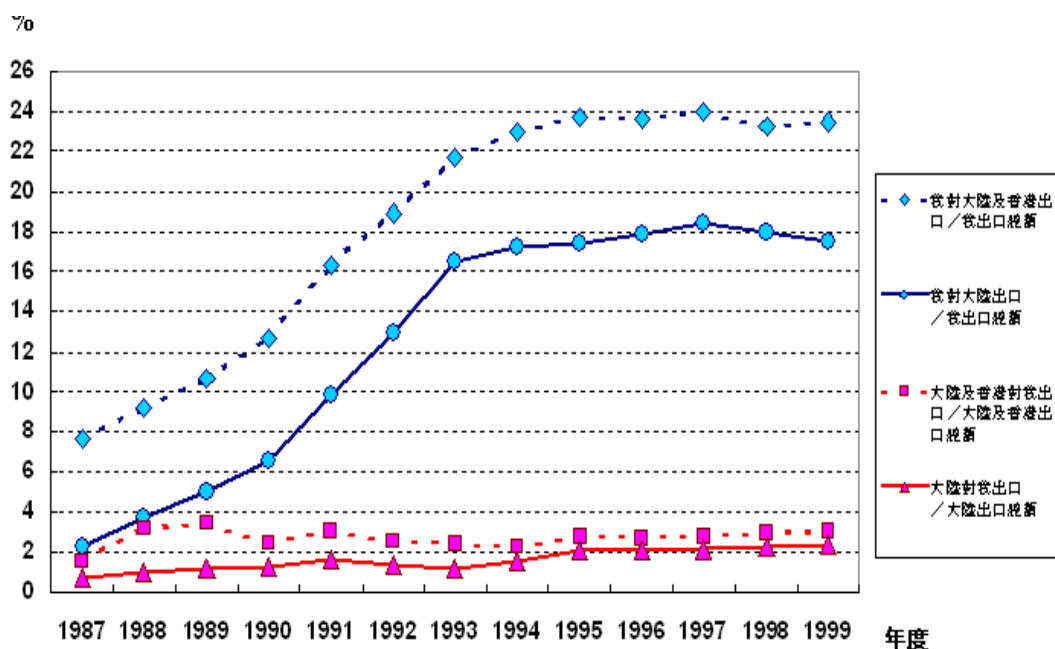
⁸ 貿易依存度指的是，進出口貿易總值佔一個國家經濟規模 (GDP) 的大小。簡言之，貿易依存度為貿易和 GDP 之間的比值。

⁹ 詳情可參見經濟部國貿局的貿易統計數據 <http://cweb.trade.gov.tw/kmDoit.asp?CAT319&CtNode=591>

¹⁰ 許振明，「自由貿易 VS 貿易戰爭」，收錄於 Paul Krugman 著作，周翠如譯，**全球經濟預言** (台北市：先覺出版社，1999 年)，頁 4。

在兩岸經貿方面，儘管台灣與大陸在政治上仍處於敵對狀態。然而，民間的經濟部門卻日益活絡，形成「下熱上冷」的局面，尤其在 90 年代初期，台灣對大陸貿易逐步解禁後，兩岸經貿互動更是頻繁。最明顯的現象在於，台灣對於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逐年攀昇(圖 1.1)，從 1990 年的 13% 竄升到 2000 年的 24%，10 年內幾乎成長將近一倍。亦據陸委會在民國 92 年 8 月份所作的《兩岸直航評估報告》指出，直航短期內會為台灣帶來 0.04% 的經濟增長，估算約 150 億美元，長期則為 1.19% 的成長率。¹¹

圖 1.1、兩岸的出口依存度 (1987~1999)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編印，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民國 89 年 1 月、香港政府統計處編印，香港對外貿易，民國 89 年 1 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兩岸經濟統計月報，民國 89 年 1 月。

在資本投資方面，1980 年代末期後，台商深受中國大陸在「市場潛力」及「勞動成本」兩項因素上的誘因影響，把投資重心逐漸轉移至中國。¹²根據中國外經貿部統計(表 1.2)，台灣對中國投資，由 1989 年的 539 件，實際投資金額 1 億 5000 多萬美金；至 2002 年，達到 4,853 件、實際金額 39 億 7 千多萬美元；台灣亦是中國第 6

¹¹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直航之影響評估報告，2003 年 8 月 15 日。

¹² 經濟部統計處編撰，製造業多角化暨國際化調查報告，1995 年，頁 380~391。

大外資來源僅次於維京、開曼群島、香港、美國和日本。台灣的產業外移結構除了以初級的勞力密集產業為主外，90年代中期後，資本和科技密集產業佔台灣對中國投資結構的比例加重，其重點就是在於開發中國的龐大的潛在市場。¹³

表 1.1、台灣在中國的投資量（1989~2002 年）

金額單位：萬美元

年 度	項目個數			合同外資金額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台灣省	全國	比重%	台灣省	全國	比重%	台灣省	全國	比重%
1989	539	5779	9.33	43169	559976	7.71	15479	339257	4.56
1990	1103	7273	15.17	88997	659611	13.49	22240	348711	6.38
1991	1735	12978	13.37	138852	1197682	11.59	46641	436634	10.68
1992	6430	48764	13.19	554335	5812351	9.54	105050	1100751	9.54
1993	10948	83437	13.12	996487	11143566	8.94	313859	2751495	11.41
1994	6247	47549	13.14	539488	8267977	6.53	339104	3376650	10.04
1995	4847	37011	13.1	584907	9128153	6.41	316155	3752053	8.43
1996	3184	24556	12.97	514098	7327642	7.02	347484	4172552	8.33
1997	3014	21001	14.35	281449	5100353	5.52	328939	4525704	7.27
1998	2970	19799	15	298168	5210205	5.72	291521	4546275	6.41
1999	2499	16918	14.77	337444	4122302	8.19	259870	4031871	6.45
2000	3108	22347	13.91	404189	6237952	6.48	229628	4071481	5.64
2001	4214	26140	16.12	691419	6919455	9.99	297994	4687759	6.36
2002	4853	34171	14.2	674084	8276833	8.14	397064	5274286	7.53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200307/20030700108208_1.xml

上述的圖表和數據清楚地表示，對外貿易和投資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容小覷。依照自由貿易的精神，台灣應當學習香港、新加坡等高貿易依存度地區，大力實行市場開放措施，如此才能使台灣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經濟民族主義在台灣經濟發展脈絡中，深深地影響到當政者的決策思維，經濟自由主義並非是戰後台灣發展初期的主要重心。其主要因素在於：

首先，就國家情勢而言，國共內戰後的台灣經濟發展初期，政府面對嚴峻的國際情勢考驗，冷戰之幕剛揭，國家安全與穩定是當時國民政府的施政核心主軸，在制度

¹³ 高長，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二版）（台北市：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168~71；童振源，全球化下的兩岸經貿關係（台北市：生智出版社，2003年），頁33~37。

尚未健全、政經環境還未成熟得前提下，若逕行實施自由市場政策，則易導致市場陷入混亂、國家處於動亂之中；¹⁴

其次，就資源稟賦來看，稀缺的資本和土地，和豐富的勞力容易產生階級的對立，¹⁵對於蔣介石政權而言，不啻為一項警訊。為了要避免重蹈在中國大陸執政失敗的覆轍，發展重工業、保護資本發展、健全財政金融、土地改革就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重要施政措施。¹⁶

不過，台灣在經濟保護主義之翼下撫育幾十年後，要素結構已明顯轉變。原本稀缺的資本，在歷經 50 及 60 年代的進出口替代時期、實行對外保護主義政策、政府大力培育國家工業基礎（如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工業）後，已經羽翼漸豐；而原本豐富的勞動力，亦因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使得國民素質不論在知識水平或是技術能力上明顯提昇；稀缺的土地，更在實施土改後，所釋放的多餘勞動力適時轉進急需勞力的工業部門，農民也因制度誘因和技術的變革，而促使農業產出在 1954 至 1967 年間以每年 4% 的表現成長。¹⁷

質言之，當前台灣擁有豐富的資本、高素質的勞動力、深厚的技術能力，以及精緻化的農業等發展優勢。因此，要素稟賦結構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改變。要素稟賦結構可與經濟結構相互呼應、一起互動。¹⁸故從要素結構的變遷而言，台灣應當是朝向更高級的產業層次邁進，提昇經濟的總體競爭能力，同時社會整體更需要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全球化快速變革的挑戰。¹⁹

然而，在討論一個國家的市場保護或開放的選擇時，絕不能單從「由外向內」

¹⁴ 王作榮，**壯志未酬**（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1999 年），頁 97~101；孫震，**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台北市：三民書局，2003 年），頁 22~28

¹⁵ 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3~11

¹⁶ 王作榮，**同前書**，頁 100~131

¹⁷ Gustav Ranis (1999), "The Trade-Growth Nexus in Taiwan's Development",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116; Trenholme Griffin (1989),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London, Eng.: published by Euromoney Books) .

¹⁸ Yifu Lin (1999),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 159.

¹⁹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3 年）。

(outside-in) 的國際面角度來探討,「由內向外」(inside-out) 的國內政經情勢也是決定一國市場開放偏好度的因素。²⁰因而,從國內角度切入,生產要素、產業型態、經濟結構、政治聯盟等面向則是重要的影響變數。

從比較優勢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會決定政治聯盟的型態,並透過政治聯盟的運作,影響該國對於市場開放和保護的態度。²¹原因在於,市場的開放與否以及開放的程度會深深影響到要素擁有者的利益,而決定的因素在於要素的豐富或稀缺程度:豐富要素稟賦擁有者,偏好市場開放;稀缺要素稟賦擁有者偏好市場保護。²²不同的要素流動性產業亦左右市場對開放與否的偏好。²³亦是,因對外貿易與交易後,所產生的「獲益」或「損失」、「輸家」或「贏家」,決定了該要素稟賦擁有者對於市場開放或保護的態度。同時,自經濟安全角度論之,「輸家/贏家」的對立亦左右了台灣在面對中國經濟崛起之際,對大陸開放政策的方向。

尤其在兩岸經貿日益發達之際,台灣是否會產生如赫胥曼(A. Hirschman)所主張的,敵國會以經濟誘惑來操控不同經濟部門的集中度,以圖影響政治部門的政策方向?或者,影響這種市場抉擇的根本問題不在經濟部門集中度的差異,而是「產業競爭」因素?或是,產業在各區域的型態影響了政治部門對於市場開放程度的態度?亦或是,經濟開放後,所產生的「階級對立」問題才是成市場偏好程度的變數?

這些背景課題和問題意識正是啟發本研究採用另一種分析角度:比較優勢理論中的 H-O 模型裡的 Stolper-Samuelson 定理(以下簡稱「S-S 定理」)及 Ricardo-Viner 定理(以下簡稱「R-V 定理」)²⁴來檢定影響台灣市場開放或保護與否的重要因素,究竟是「區域差距」、「產業競爭」或「階級對立」?

²⁰ Andrew Sobel (1994), *Domestic Choice, International Markets: Dismantling National Barriers and Liberalizing Securities Market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15~16

²¹ 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²² Wolfgang Stolper, Paul Samuelson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pp.58~73.

²³ 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²⁴ 這兩種定理的差異點在於, H-O 模型強調要素具有高度流動性,而 R-V 定理剛好相反。但兩者都強調要素稟賦對於貿易的重要性。詳情可參閱 Joseph F Francois, Douglas Nelson (2002), "A geometry of specializ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pp.649~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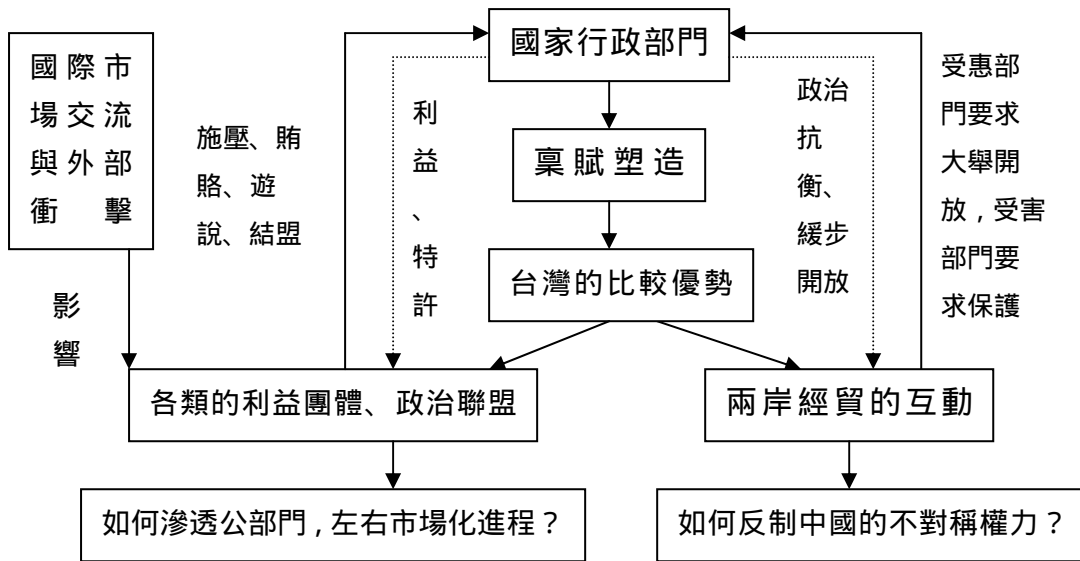
（二）研究目的

從 90 年代的全球經濟發展的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勾勒出幾項台灣在面對市場開放與否的背景因素：

1. 就國際貿易部分：自由貿易會促使全球經濟福利的增加，但是這並不表示，每個國家必會從貿易中獲益。國內的要素秉賦結構是政府支持保護或開放的主要因素之一；
2. 就全球潮流部分：拜技術提昇、運輸成本降低、貿易資本管制日益解除和生產更加專業化之賜，經濟自由主義浪潮席捲整個 90 年代；
3. 在對外貿易部分：高的貿易依存度是台灣經濟能夠維持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簡言之，出口導向成長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色；
4. 在兩岸經貿部分：幾十年來，儘管政治上的敵對依舊，兩岸的貿易依存度卻持續攀昇，台灣經濟部門對於中國的依賴日益加重，但政治上卻仍採取敵對的態勢；
5. 在資源稟賦部分：在台灣擁有龐大的資本、技術和充足且高素質的勞力；豐富的要素稟賦對於自由貿易和開放擁有高度的偏好；
6. 就政治聯盟部分：要素稟賦豐富程度會決定市場保護或開放的抉擇，主要的影響方式是透過政治聯盟來獲取自身的利益；

因此，綜合上述立論，本研究的核心論述將強調三組討論議題，第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是如何透過行政手段形塑台灣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形成何種政經結構，進而影響台灣面對市場開放與否的偏好？第二、在邁向市場自由化後，國際交流如何決定台灣不同經濟部門的利益？各類的經濟偏好又如何左右市場化進程的走向，並形成特定的利益聯盟？第三、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之際，台灣面對中國的施壓只能以消極抵抗來進行對抗？台灣應如何利用本身的比較優勢反制中方對台施予的不對稱權力？本文並自上述的課題中，做出圖 1.2 的研究架構。

圖 1.2、問題意識與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二、 文獻檢閱

(一) 方法論的檢討

根據古伯 (R. Cooper) 的看法，他主張把文獻回顧分為兩種類，理論型及整合研究型：²⁵

理論型回顧 (theoretical review)：

此種理論回顧者希望呈現出能解釋某一種特殊現象的理論，並且比較這些理論的範圍、內在一致性和其預測性。

整合型研究回顧：

此主要在於討論多元但又與該研究相關的假設性文獻，以做一完整的結論來綜合整理過去的研究，整合型的研究回顧者希望能呈現相關的知識，和強調以往研究所沒有解決的重要議題。

²⁵ 古伯 (Cooper)，高美英譯，**研究文獻之回顧與整合** (台北市：宏智文化出版，1999 年)。

而本研究將匯集這兩種文獻回顧法，結合過去相關的研究國內、外在選擇市場自由或開放研究的重要文獻，和政、經相關理論的回顧，來做為本研究的立論支持。首先，本研究首先在方法論上做探討，以此檢討政治經濟學在分析基礎上的優劣點。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常常出現經濟學與政治學對於事件發生原因的觀點衝突。²⁶經濟學家常從經濟學特有的方法論，如不干涉主義或理性行為模式來探討人類行為。而政治學家著重的分析觀點則在於，行為者的政治動機和制度面的影響。²⁷

然而，這樣過於偏某一面向的見解經常會侷限住研究者對於看待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因而，整合政治學所強調的制度結構面和經濟學所重視的行為微觀面兩大觀點，則是當前研究者在從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上最需要突破的一點。

包德溫（R. Baldwin）認為，²⁸經濟學所強調的自利、理性行為在分析廠商和消費者行為時是相當有用的。然而，這樣的分析模式卻忽略掉制度結構、意識型態或是政府單位的影響力；²⁹相反地，政治學則側重結構面的考量，這在討論廣泛的決策過程時較有說服力，但這樣的觀點卻忽略了行為者，如利益團體或個人在微觀層次的影響性。因此，包德溫提出，在討論政治經濟學時，應包含政府、利益團體、個人和外國勢力等四方面的行為體來做通盤考量，如此才可彌補純經濟學或政治學在分析上的缺憾。³⁰

因此，本研究將會結合政治和經濟學的方法論觀點，把關係到政經運作的行為體，如政府體制、要素秉賦和政經團體等因素考量進去，以完善本研究在運用政治經濟學上的內涵。

²⁶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為 Jeffrey Frankel, Miles Kahler, ed. (1993),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該書清楚地闡明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對於解釋國際政治經濟學問題時的重大歧見及觀點的明顯差異。

²⁷ Gilpin, Robert (2001),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2.

²⁸ Robert, Baldwin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tegra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Robert Feenstra, Gene Grossma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Papers in Honor of Jagdish Bhagwat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147~174.

²⁹ 對於經濟學家過於強調市場角色，有政經學家提出批評，認為市場其實是政治建構下的產物。Chang, Ha-Joon (2000),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oward Institutional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Burlamaqui & Castro, Chang ed., *Institut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USA, MA: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pp.3~26.

³⁰ Baldwin, Rober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Papers in Honor of Jagdish Bhagwati*, pp.171~172.

(二) 理論檢閱：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的相關論述

探討比較優勢理論的文獻頗豐，³¹主要論述的核心都源自於李嘉圖對於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的駁斥：國家間的貿易之所以能夠產生，都有賴於每個國家本身的資源差異性，透過資源差異性的互補，而達到互通有無的雙贏局面。³²

不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主要的論述基礎在於「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 factor model) 的強調上。李嘉圖認為，除了勞動力外，資本和土地都是不可移動的，而勞動力的移動性雖有較大的流動性，但也祇能侷限在國內而已；更重要地一點，李嘉圖模型強調，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是在於每個國家的要素生產力的差異。³³

該種假設經過時空的演變，在貿易體系的解釋上產生了相當大的盲點。因此，H-O 模型的產生，就是在於彌補李嘉圖對於要素流動性設定上的缺失。其所包含的四大定理：H-O 定理、Stolper-Samuelson 定理³⁴、要素均等定理 (FPE) 以及 Rybczynski 定理，其理論假定都基於對要素自由流動的強調上，且每個國家會依照本身的優勢 / 劣勢資源稟賦，來出口和進口需要的物品，要素間的相對價格 (relative price) 會因為此交流而逐漸收斂 (convergence)。³⁵

換言之，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而不同的要素稟賦產生不同的要素成本，要素越豐富，其成本越低。最後，這些成本差異會因貿易往來逐漸縮小。和李嘉

³¹ Charles Hill (1997),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Chicago: Irwin), Ch.4.; Paul Krgman, Maurice Obstfeld (1997),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Longman), Ch3~Ch4; Salvatore, Dominick (200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John Wiley), pp.35~49; Robert Dunn, James Ingram (1996),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pp.13~26.

³² 保羅 克魯曼 (Paul Krugman), 「導論：貿易政策的新思路」, 收錄於保羅 克魯曼主編, **戰略性貿易政策與新國際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4~25; Gomory Ralph, William Baulmol (2000),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h6.

³³ 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台北:雙葉書廊出版社,2002年5月),頁24~60; Joseph Francois, Douglas Nelson (2002), "A geometry of specializ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pp. 649~679.

³⁴ 該定理主張,貿易對稟賦豐富的要素有利,但對稀缺要素不利。因而該豐富要素的擁有者傾向開放,稀缺要素的擁有者傾向市場保護。Wolfgang Stolper, Paul Samuelson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 pp.58~73.

³⁵ Dominick Salvatore (200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136~137.

圖理論差異的地方在於，H-O 模型認為國際貿易是由要素稟賦差異，而非生產效率的差異來決定。³⁶

就現實生活中，要素的流動性既非自由流動，亦非完全無法流動，而是界在兩者之間。因而，這兩種理論都不斷地在作修正。近年來，Ricardo-Viner 定理雖強調特殊要素模型，但是，該理論卻修正了李嘉圖原先所強調的要素不可流動性的假設基礎上。R-V 模型認為，要素是具流動性的，只是流動性效果並沒有像 H-O 模型那麼大。由此模型所延伸出的貿易和政治型態也與 H-O 模型假定下的互有差異。³⁷

本文主要論點在於證明，要素稟賦結構對一個國家在面對開放或保護的抉擇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更再檢證，要素豐富程度與開放與否的態度成正比，而此市場開放與否的偏好會透過制度面影響政治部門的型態。³⁸此衍生出，S-S 定理對國會在處理貿易政策立場的影響性是依據經濟部門的特質而定的看法。³⁹或從 R-V 定理的「低要素流動性」角度出發，探討生產要素利益對政治型態和政府決策的影響。⁴⁰

職是之，貿易和對外開放深刻地影響了要素的收入和所得重分配 (income redistribution)，進而產生出市場開放後「輸家」和「贏家」的區別。⁴¹更甚者，影響到國內政治結構的型態。在羅高斯基 (R. Rogowski) 的研究中，其主張，在「S-S 定理」的基礎下，貿易對於一個國家政治型態的衝擊，端視於該國家的要素稟賦的結構差異

³⁶ Charles Hill (1997),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pp.138~143.

³⁷ 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3~11; 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p.1~17.

³⁸ Peter Gourevitch (1977),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es of 1873~189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II (2), pp.281~313; Douglas Irwin (1996), "Industry or Class Cleavages over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23", in Feenstra etc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53~77; Jeffrey Frieden, Ron Rogowski (1996),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 An Analytical Overview", in Keohan & Milner 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5~48.

³⁹ Eugene Beaulieu (2002), "The Stolper-Samulson Theorem Faces Congres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0, No. 2, pp.343~360.

⁴⁰ James Alt, Carlsen, Fredrik Heum, Per (1999),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Firms: Lobbying for Subsidies in Norwa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1, pp.99~116; Garst, Daniel (1999), "From Sectoral Linkages to Class Conflict: Trade and Coalition Formation in Britain Prior to and After W.W. I.",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2, No.7, pp.788~809.

⁴¹ Ethan Kapstein (2000),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pp.359~384

性：不同的資源稟賦，在面對開放後，可能會形成「城鄉分裂」和「階級分裂」兩種政治聯盟的模式（表 1.2）。⁴²

表 1.2、貿易擴張的預期影響

	土地-勞動比 (land / labor Ratio)	
	高	低
先進經濟體	<p>階級分裂</p> <p>土地、資本豐富</p> <p>政治聯盟</p> <p>(贊成自由貿易)</p> <p>勞動稀缺</p> <p>(贊成保護主義)</p>	<p>城鄉分裂</p> <p>資本與勞動豐富</p> <p>政治聯盟</p> <p>(贊成自由貿易)</p> <p>土地稀缺</p> <p>(贊成保護主義)</p>
落後經濟體	<p>城鄉分裂</p> <p>土地豐富</p> <p>(贊成自由貿易)</p> <p>勞力和資本稀缺</p> <p>政治聯盟</p> <p>(贊成保護主義)</p>	<p>階級分裂</p> <p>勞力豐富</p> <p>(贊成自由貿易)</p> <p>土地和資本稀缺</p> <p>政治聯盟</p> <p>(贊成保護主義)</p>

資料來源：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8

儘管此分類模型讓貿易政經理論的視野更加擴展。然而，這樣的分析模式卻無法解釋為何當今許多國家在面對貿易開放和保護的抉擇時，是由產業面來主導，要素稟賦的影響力反而不再那麼大。左右市場開放性態度的，從原本的生產要素面(factors of

⁴² R.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8

production)，漸漸地轉移到經濟部門 (economic sectors) 的手上。⁴³因而，產生了進口競爭部門 (import-competing sector) 和出口競爭部門 (export-competing sector) 之間的抗衡型態。針對此一課題，西斯考 (M. Hiscox) 認為，要素流動性的高低才是決定該國政治部門對於貿易保護和開放的關鍵因素 (表 1.3)。

表 1.3、要素流動性程度的預期影響

要素流動的程度	聯盟型態	對階級政黨 (class-based parties) 和組織的影響力	對產業團體 (industrial group) 的影響力
低	產業聯盟	內部會因貿易議題而分裂並對開放或保護的議題採取較為模糊的政策立場	進口競爭型產業積極地為保護而遊說；出口競爭型則為開放遊說
高	階級聯盟	各階級內部會因貿易議題而更加團結並對保護和開放的態度逕渭分明	不積極遊說

資料來源：Hiscox, Michael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9

然而，西斯考 (M. Hiscox) 模型最大的盲點在於，其過分簡化政治聯盟的型態，簡易地分為「產業聯盟」和「階級聯盟」兩種，並認為大多數的時期只會出現其中一種聯盟型態。但事實上，這兩種不同流動性的要素所產生的聯盟，是有可能並存於每個時期，並形成「產業聯盟」對抗「階級聯盟」的態勢。以台灣在 90 年代後的發展為例，因市場國際化加深和兩岸經貿發達，促使「產業競爭」白熱化，結果產生弱

⁴³ Jeffrey Frieden, R. Rogowski (1996),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p.38.

勢產業衰落或外移及低技術工人的流離失所，其連帶的失業和貧富不均的擴大，讓台灣的社會階層逐漸分化，社會的「階級對立」面逐漸浮現出來。這明顯地呈現出「產業競爭」和「階級對立」之間的張力關係。

此外，上述表 1.2 和 1.3 的分析模型主要是針對該國對於貿易保護和開放的部分作討論。然而，該兩模型卻忽略了「資本流通」部分。針對該項模型的缺失，佛來登 (Frieden) 即提出，⁴⁴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會造成國內不同政經群體的衝擊。因而，不同的群體將形成不同政策立場的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s)。換言之，不同的經濟利益團體對於資本流通的敏感性和需求度將決定其對經濟政策的立場。針對該議題，本研究將會在第三章中，以此對國家能力和市場開放間的互動進行更深入的論述分析。

(三) 整合型研究回顧：影響市場開放和保護因素的討論

在討論一個國家在市場開放的抉擇和政治部門的相互影響時，有許多不同的研究途徑值得探析。朱雲漢從比較政治的觀點，以國家體制結構及經濟官僚途徑，探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 (NIC)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調整問題。⁴⁵另有研究從資金流通和制度演變論點，探析國家政府面對資本開放時，與國際市場間衝突和調和的互動情形的研究也頗具成果。⁴⁶在這些研究中我們發現，這些東亞國家的政府在長期的發展脈絡中，扮演了積極介入、形塑比較優勢的角色。⁴⁷台灣在這個環境下，國家透過行政力量來培育高素質人力、資金和進行土地配置的優化，以期達到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目的。

⁴⁴ Jeffrey Frieden (1991),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5, pp.425~51.

⁴⁵ Yun-han Chu (1989), "Stat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4, pp.647~672.

⁴⁶ Andrew Sobel (1994), *Domestic Choice, International Markets: Dismantling National Barriers and Liberalizing Securities Market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njamin, Cohen (1998), *The geography of mone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⁴⁷ A. H Amsden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Wade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全球經濟市場開放與勞動關係之間的互動情形，更是左右政治部門對外經濟策略的重要考量。羅瑞克（Dani Rodrik）就認為，市場開放與國際接軌後，會造成勞動市場內的分化，把勞動者區分為技術勞工和非技術勞工，每個類別的勞動者其競爭力也不一樣，其受到的衝擊更是造成社會動亂和不安的主要來源之一。⁴⁸經濟開放後，侵蝕了因地域流動和技術能力受限的勞動者的生存利基，進而造成的要素所得不均、福利差異的鴻溝擴大，使得要求政策保護（如產業補貼、失業救助、優惠措施等）的聲浪更加澎湃，⁴⁹這樣的現象促使政府的角色日益吃重，而社會的「階級對立」面也逐漸擴大。

該些議題明確地點出，政府在面對市場開放與否的抉擇時，除了考量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和外部衝擊外，更受到內部條件的制約。不同的政府體制，受內部制約的影響程度不同，所制定出來的政策方針也就有所不同。⁵⁰左派政府需搭配強而有力的工會組織，才有可能獲取政策執行的有效性；相反地，右派政府需搭配弱勢工會，如此才能讓總體經濟政策有效果。

至於內部制約的因素可來自許多面向，有國內政治結構的影響、利益團體的遊說、政府官僚的影響、國會的制衡和社會團體的勢力等，使得政府在考量經濟政策時，必須顧及到各領域的意見和利益，制定出符合最大公約數的政策。⁵¹

除了從「政府／社會」途徑討論開放和保護的課題外，亦有從各國間的資源稟賦差異來著手。伍德（Adrian Wood）認為，國家間的貿易型態並非一成不變，傳統的靜態比較優勢套用在當今國際貿易的發展時，出現相當大的盲點。取而代之地，動態比較優勢才是國際貿易不斷推進的本質。其中，教育和技術的提昇正是促使比較優勢

⁴⁸ 羅瑞克（D. Rodrik），*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12~31。

⁴⁹ Susan Collins (1998), *Imports, Export,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3; William Cline (1997),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Washington: D. C.: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1; James Goldsmith (1996), "The winners and the losers", in Mander & Goldsmith ed., *The cas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or a turn toward the local*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pp.171~179.

⁵⁰ Geoffrey Garrett (1998),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Held & McGrew e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struction to Global Debate*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pp.301~318.

⁵¹ 何思因，*同前書*，同註2，頁67~132。

轉變的重要推力。⁵²

換言之，啟動動態比較優勢的發動機，取決於國家內部在生產要素層次上的提昇，這正是內生成長論重要的立論基礎：經濟成長與生產要素的內生進步成正比；國家的經濟結構、制度和公共政策更是影響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⁵³在某種程度而言，此理論肯定了政府的角色。因此，受到許多新凱因斯福利國家的偏愛，以此作為國家介入經濟運作的和提昇國際經濟地位的理论基礎。

儘管，許多學者承認國家在幫助經濟發展和路線選擇時的角色具有重要性。不過，自由派學者卻認為，國家在主導自由發展或對外開放的政策時，應該盡量少插手干預，政府的工作應只是扮演輔導的角色，營造有利於企業競爭的環境，幫助產業發揮潛力和全球化策略，讓產業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積極拓展事業版圖。⁵⁴同時，該派人士亦對經濟一體化、市場開放和貿易深化後所帶來的商機和前景感到樂觀。⁵⁵

不過，這樣的主張，卻受到弱勢產業的挑戰。原因在於，許多要素流動低的弱勢產業為了生存，即使面對外來競爭，仍會透過政治影響和風險規避（risk-aversion）的管道而尋求政府的庇護，如「關稅保護」。⁵⁶同時，政府也為培養具有戰略性發展的產業而給予補助和保護，使其在國際競爭上保有優勢地位。⁵⁷是以，政府和產業間的互動會因國際競爭的壓力而更加密切。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不難發現，上述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從「國家政府」、「社會階層」和「商業競爭」三者間的互動角度出發。然而，這樣的解釋分析卻因運輸成本的

⁵² Adrian Wood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10

⁵³ Paul Romer (1994),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8, No. 1, pp.3~22; Gene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1994),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8, No. 1, pp.23~44; Robert Gilpin (2001),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5.

⁵⁴ Michael Porter (1991),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⁵⁵ 巴格瓦蒂 (J. Bhagwati), *現代自由貿易*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年); Dani Rodrik (1999),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Baltimore, Md.: Distribut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⁵⁶ Ngo Van long, Neil Vousden (1991), "Protectionist Responses and Declin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0, pp.87~104.

⁵⁷ 此為有名的「戰略性貿易理論」核心論述基礎，其理論假設推翻了古典經濟學是完全競爭和固定報酬假設，主張市場為不完全競爭和追求規模經濟的。詳情可參閱 James Brander, Barbara Spencer (1983), "International R & D Rivalr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Vol. 50, No.163, pp.707~722; 保羅 克魯曼 (Paul Krugman), *同前書*。

降低、資訊和資本快速流通、生產更加專業化，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國家地理疆界的逐漸模糊化而受到挑戰。⁵⁸國內、外的經濟區塊的互動日漸成為研究的重點：有「中心／外圍」的分析觀念，或從「國家／地區發展」互動的解析，⁵⁹或從「區位特定優勢」，利用外國當地固有的要素稟賦或資產優勢來做投資的方向探討。⁶⁰這些分析角度套用到區域經濟的研究範疇內，更可豐富經濟因素對國家選擇開放或保護的影響內涵。換言之，經濟地理對政治部門衝擊的影響已經不容小覷。⁶¹

利用經濟集中度的控制以實行經濟槓桿操作亦是台灣在面對兩岸交流時，所必須處理的「經濟安全」課題。赫胥曼（Albert Hirschman）以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案例來論證，德國透過德國市場的吸力、貿易的互動、資金投資、人員和技術等要素的滲透，以對中東歐小國進行政治操控，造成中東歐小國的經濟部門過於集中在特定的產業，受到德國市場的深度制約，提供德國向該些小國施行不對稱權力的機會。⁶²此歷史個案提供了兩岸互動的另番思維，台灣的條件不應是中東歐小國的角色，以台灣本身在資金、人力和技術的豐沛要素，亦可反制中國的不對稱權力的施予。

因此，從上述的文獻檢閱中，不管從政府體制角度出發、產業利益考量、社會階級的關懷、或從經濟安全的角度研究，都可幫助本研究更深入地以要素稟賦和經濟部門特質的角度來檢測，台灣面對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潮流時，所應採取的回應機制。

三、 研究途徑及限制

（一） 概念界定

本研究將從比較優勢分析（comparative advantage）為主要分析途徑，並以「要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為基礎分析單位，以討論生產要素在面對國際化的衝擊時，

⁵⁸ Paul Krugman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h1.

⁵⁹ 耿曙，「中國大陸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起源：國家、市場、區域開發」，*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四十五卷第三期，2002年5、6月，頁27~58。

⁶⁰ John Dunning (1988),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London; Boston: Unwin Hyman), pp.1~13.

⁶¹ 耿曙、陳陸輝，「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難北區塊差異的推手？」，*問題與研究*（台北），第42卷第六期，2003年11、12月，頁1~28。

⁶² Albert Hirschman (1945),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對於市場開放或保護的抉擇所作出的回應。其最重要的反應就是透過組成「組織」(organization)來表達該要素的利益和意見。此節將為本研究所要分析的要素稟賦和組織作一清楚簡單的界定：

1. 要素稟賦 (factor endowment)：

經濟的運行必須由許多的零件來組成，在傳統經濟學中，這樣的「零件」稱之為生產要素 (production factor)。當經濟體在進行交易時 (如國際貿易)，生產要素的多寡程度就形成所謂的要素稟賦 (factor endowment)。這樣的要素包含相當多種，如：勞動、資本、土地、能源、知識、技術及企業家精神等等。本研究為了簡化分析單位以方便研究的進行，因此，採用古典經濟學中的主要三項要素來作為分析單位：⁶³

(1) 勞動者 (labor)：意指藉由勞力獲得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勞動者越多時，代表其要素稟賦越豐；反之亦然。一般而言，勞動力的流動性較資本高。此外，依據本研究需要 (要素稀缺性及流動性對政治聯盟形態的影響)，吾人亦把勞動者假定為：

a.) 產業間流動能力高的「技術勞動者」(單位勞動生產力高)；b.) 產業間流動能力低的「非技術勞動者」(單位勞動生產力低)兩種。⁶⁴在此研究中亦假定，非技術勞動者的「勞動替代彈性」較技術勞動者大。

(2) 資本 (capital)：經濟學上的資本意指「生產工具」，例如廠房、機器設備，故又稱資本財或實體資本，此概念唯一種存量 (stock) 的概念，即某固定時間點，該經濟體系現有的資本財總量。⁶⁵其主要的獲益是從資本投資而來。其要素的豐富程度由資本存量及「資本-勞動比」(K/L) 決定。⁶⁶此外，在羅高斯基 (Rogowski) 的定義中，資本家 (capitalist) 亦指涉，主要能從投資⁶⁷而獲益的的生產者。⁶⁸就傳統經濟

⁶³ 本研究的架構依循著 Ron Rogowski 及 Michael Hiscox 兩位著作的方法論為分析藍本來作進一步地詮釋 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19; 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p1~41.

⁶⁴ 主要是依此來探討勞動要素的流動能力。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13.

⁶⁵ 吳麗瑩、張原卿，*個體經濟學：理論與運用* (台北市：雙葉書廊出版社，2000年)，頁362。

⁶⁶ 此概念源自於新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模型，最早由 Robert Solow 於 50 年代末期提出。該學派認為，經濟成長是由「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和「技術進步」三方面來決定，亦是 Y(K, L, a)。Jeffery Sachs, Felipe Larrain (1993), *Macroeconom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Ch8.

⁶⁷ 「投資」可區分為 1. 「實物投資」，代表將資金和資源投入到生產經營領域的投資活動上；2. 「證券

學理論而言，資本的流動性稍比勞動者低，長期而言，才具有較大的變動彈性。然而，資金（finance）則不同，因技術提昇和管制解除等因素而具有高度流動性。⁶⁹

(3) 土地（land）：在本研究中，土地意指「可耕地」，原因在於，可耕地才能使得土地的擁有者獲益。⁷⁰其要素稟賦的豐富程度，由「勞動／土地」的比值來決定：比值越小者，代表土地稟賦越豐；反之亦然。此種要素的流動性是所有要素稟賦中最低的。

以下為要素稟賦豐富與否的決定因素及流動性比較表（表 1.4）：

表 1.4、稟賦豐富度與流動性比較表

	勞動	資本	土地
要素稀缺程度的決定因素	勞動-土地比（L / land）：比值越高，勞動稟賦越豐富。	資本-勞動比（K / L）：比值越大，資本稟賦越豐富。	勞動-土地比（L / land）：比值越小，土地稟賦越豐。
要素流動性	高。但技術勞動者的產 間移動較非技術勞動 者高，且非技術勞動者 的要素替代彈性大*。	較低。短期內變動程度 小，視為給定。長期才 有變動彈性。資金的流 動性較實體資本大**。	最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備註：* 要素替代彈性越大者，其被其他要素取代的可能性就越高。

** 由於金融管制的解除和科技的進步，資金的流動性甚至會比勞動要素高。

投資」，投資者將資金以購買股票方式介入生產經營領域的投資活動上。曾艷玲，*英漢西方經濟學辭典*（北京市：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頁415。

⁶⁸ 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19

⁶⁹ Frieden 認為，資金的流動率最高，其次是股票和債券，特定資產和資本則是流動率最低的。Frieden (1991),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426~432

⁷⁰ Ronald Rogowski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19,

2. 組織型態 (organization) :

此為產生和影響政治聯盟屬性的重要因素。依據本研究需要，吾人把該團體歸類為政黨 (party) 貿易及產業聯盟 (trade / industrial union) 及工會組織 (labor union) 社會團體 (association) 等幾種類別。⁷¹

(二)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研究範圍：

在時間上，本論文雖欲探討自 1990 年代後至今的台灣政經發展局勢為主，涵蓋的領域是以區域經濟和政治聯盟的相互影響為核心。但在歷史脈絡上，仍先從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建設分析起。本研究的分析以 90 年代前的發展為輔，以 90 年代後的國內政經發展，及對外與中國大陸的互動架構為主軸。

在分析對象上，本研究是以要素稟賦為探討的單位，並由此延伸出區域經濟、產業、政治部門和社會階層對於市場開放和保護的看法。

就理論上，本研究以國際貿易理論為主要分析途徑，其中的比較優勢分析為本文的研究工具，而新興經濟發展理論 - 如新古典成長論、內生成長理論和戰略貿易理論等 - 則為輔佐比較優勢理論在現象上的解釋。

2、 研究限制：

在變數的設定上，由於範圍設定的關係，在分析經濟要素結構的過程中，本研究剔除掉文化領域、國家認同、年齡、成長背景、統獨爭議、意識型態和社會心理層面的變數。因此，在研究的視野上，將侷限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交互影響，無法顧及上述變數對於市場的衝擊。

在要素稟賦的探討上，為了簡化分析工具的繁雜度，本研究採行的是古典經濟理論的觀點，對於其他生產要素，諸如能源、企業家精神、自然資源、知識等等因素，則必須排除在分析之外。因此，這些被捨棄的要素的影響性，則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

⁷¹ 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p.35~38.

圍之內。

在模型運用上，由於羅高斯基及西斯考的分析模型並非完全適用於台灣的現況，因此，本研究將採行其部分的理論觀點，並以佛來登的分析模型作為補充，以彌補適用性不足的問題。

四、 章節安排和預期結果

（一） 章節安排

本研究所進行的論述，首先以「重商主義」觀點分析台灣在威權體制下，國家是如何透過培養要素稟賦而達到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目的？同時，在冷戰時期和威權體制的交互作用下，台灣在發展過程中，國家高度的主導性和自主性都以單向的方式對社會資源的流向進行調控。底層的私人經濟部門並沒有機會滲透入公部門的決策體系中，而獲得尋租的機會。

其次，第三章中，吾人再以國內政商聯盟的角度論析，在國際交流的衝擊下，台灣的不同要素稟賦形成個別的利益團體，透過政治參與的開放，滲入公部門的決策體系中，影響國家政策走向和競逐經濟特許。這種現象造成原有的國家能力受到嚴重侵蝕，政策的效度和本意都受到扭曲，政府應透過在管制（re-regulation）的方式促進市場的競爭性以確保國家能力；再者，第四章亦從兩岸經貿互動觀點論之，台灣在面對中國強權崛起之際，台灣可透過高素質人力、技術、資金對中國的經濟誘惑和制裁進行反制，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並非中國所獨有，如何運用台商的力量取得壟斷性市場力量將是我方政府可努力的方向。最後，本文將提出，台灣在開放後所處理的課題和發展的重心，應集中在市場規範的完善性及社會福利政策的完整性，以提供台灣取得最大利益的基礎。

（二） 預期結果

理論上，時間脈絡越長，生產要素流動性越大，要素的「階級」對立面也就會越

明顯，例如資本家對抗勞動者，或是土地擁有者對抗勞資階級等。相反地，時間越短，要素流動性越小，所造成的要素對立面主要是以產業別（經濟部門）為主，如「進口競爭產業」對抗「出口競爭產業」。

現實中，台灣這十幾年來所浮現出來的態勢是，由於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壓力，許多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業急欲往外移動，以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這類的產業大多是運輸、科技、金融和出口型的製造業等。但同時，也有一些進口競爭產業不願開放，力主市場保護，可能的因素為：資源移動不易或無法轉移、技術層次過低，或是退出市場後的風險成本太大，這類的產業如房地產、鋼鐵、農產業等為代表。

因此，90年代期間，台灣的要素對立面主要是鎖定在「產業競爭」。然而，在90年代後期，由於國際競爭愈烈和台灣經濟結構轉變的影響，造成許多進口競爭型產業（如勞力密集產業）的沒落或衰退，使得產業所屬的勞動者大量失業。更不幸地，這些勞動者往往是歸類為低技術層次或是中高年齡層勞動者，轉業不易，使得結構型失業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同時，市場衝擊和稅制不公的因素，也逼使這群弱勢族群的生活更加困難。

更不幸地，由於財團和政治派系對公部門的滲透，導致經濟特許權和社會資源逐漸流向少數的私人部門，一般大眾只能在旁觀之，而無法共同獲益；再加上國際資本流動的衝擊，亦讓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更加明顯，「階級對立」的種子逐漸在90年代後期萌芽，而成為社會不安和不穩定的引爆點。

再者，在「兩岸經貿政策」上，一方面台灣面對了中國的軍事威脅，在政治上是採取抵抗和不服從的態度，另一方面，在經貿交流上呈現出緊密相連的不同景象。中國利用經濟槓桿來吸引台灣的經濟部門，如石化業、運輸業、高科技產業、製造業等，以圖利用經濟手段來達到統一的政治目的。以經濟部門為例，出口競爭產業則會是放鬆兩岸經貿管制的受惠者；但同時，進口競爭產業則會受到巨大的衝擊和挑戰。缺乏競爭力的產業因日益開放和競爭而凋敝，其所釋放出的低技術或中高齡失業者將可能會是產生台灣「階級對立」白熱化的重要因素；這種「階級對立」所衍生出的結果將會影響政治上對中國是否採取開放態度的主因之一。

因此，不同的經濟利益所產生的政治效果讓台灣的政治與經濟偏好同時呈現出互斥和互補的奇景。台商的角色一直是我方所爭議的話題，本文則認為，台灣若能運用台商的政治角色，積極進取中國的特定部門，則能提高中國對台制裁甚至發動戰爭的成本，以緩和原有的不對稱依賴結構。

最後，台灣的市場對外開放後，一來確實會讓台灣獲取龐大的經濟利益，然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因此，弱勢勞動者（或產業）將是偏好市場封閉和尋求政府保護的一群。進而，國家將會因此支出更多的社會保險或福利支出。因此，一個健全的社會福利體制是緩和國際交流衝擊的緩衝器，這是政府所應極力去建構的社會安全網。